



FINANCE CENTER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

2017 年南南合作报告
2017 South-South Cooperation Report

TOWARDS 2030 迈向 2030:

南南合作在全球发展体系中的 角色变化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 / 编著

CHANGING ROLES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GLOBAL DEVELOPMENT SYSTEM



FINANCE CENTER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

2017 年南南合作报告
2017 South-South Cooperation Report

迈向 2030: 南南合作在全球发展体系中的 角色变化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 / 编著

C H A N G I N G R O L E S O F
S O U T H - S O U T H C O O P E R A T I O N I N
G L O B A L D E V E L O P M E N T S Y S T E 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迈向 2030：南南合作在全球发展体系中的角色变化 /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编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 - 7 - 5201 - 1936 - 8

I. ①迈… II. ①南… III. ①南南合作 - 研究报告
IV. ①F114.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1701 号

迈向 2030：南南合作在全球发展体系中的角色变化

编 著 /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恽 薇 王婧怡

责任编辑 / 王婧怡 吴丽平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分社 (010) 5936722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24.75 字 数：505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1936 - 8

定 价 / 1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贺 词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就南南合作年度报告《迈向 2030：南南合作在全球发展体系中的角色变化》的出版，向南南合作金融中心表示祝贺。该报告反映了南南合作在当今发展格局中的历史视角和当前转型。它介绍了新兴经济体、发展伙伴和多边机构为促进南南合作而开展的拓展性的战略和做法。因此，该报告涵盖概念与实践，堪称南南合作的知识宝库。

这份报告也是南南合作话语转变的一个例子。鉴于过去南南合作受到实证分析缺乏严谨性的挑战，该报告汇集了全球南方知名学者和思想家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均由有实证基础的案例作为支撑。因此，正如预期的那样，报告反映了与国际发展合作相关的广泛问题的多元化独立观点，有批评也有赞誉；并指出了南南合作的互补性以及南北合作的主要差异。

这一报告的出炉正当其时，因为国际社会正在准备举办一个联合国南南合作高层会议（BAPA + 40），来纪念“布宜诺斯艾利斯发展中国家合作行动计划”四十周年。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正在支持一项关于南南合作的全球智库网络联盟，以增强这一背景下的南方观点和思想的领导力，使政策的制定者和实践者知晓多元化的观点，从而加快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步伐。我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由全球南方机构领导和产出的知识产物，从而丰富对这一重要议程的讨论。

Jorge Chediek

联合国秘书长南南合作特使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主任

前言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对终结贫困、保护地球并确保全人类共享和平与繁荣的共同呼吁。

然而，议程与目标是一回事，如何实施则是另一回事。21 世纪以来，尤其是 2007 ~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整个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会给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带来不确定性和挑战。

为了应对这些新的挑战，多个国家联合创建了两家规模很大的多边发展银行：一个是支持以基础设施为导向的发展观，并强调区域性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另一个是强调可持续发展和可再生能源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它们可以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框架内适应更广泛的目标。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加强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和贸易联系促进国际发展合作。从现实意义上讲，这意味着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物流和运输网络。从长远意义上讲，则意味着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发展合作创造了更优越的条件。

另一个重大变化是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国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发展合作的格局不断变化，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由于发展中国家具有卓越的比较优势，南南合作备受欢迎。中国等主要新兴国家将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发展项目发挥更大的作用，而现有的南南合作正在形成新的势头。

除了其他考虑因素以外，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及教训，与仍在追赶的发展中国家十分相关。鉴于发展合作格局的动态变化，2017 年南南合作报告专注于面向 2030 年展望南南合作在全球发展体系中的角色变化，这样的主题恰逢其时。

蔡鄂生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

致 谢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和经济发展。南南合作金融中心除了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促进发展融资和工业化项目支持外，还组织专家编著了 2017 年南南合作报告《迈向 2030：南南合作在全球发展体系中的角色变化》。

为此，南南合作金融中心邀请了一批全世界知名的学者来撰写这一报告。这些学者以及他们所写的章节如下。

- 林毅夫教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第四章《发展合作的新机制与新方法》，与王燕教授（乔治·华盛顿大学访问教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合作完成。

- 张蕴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第八章《“一带一路”与新兴发展合作》，与张中元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合作完成。

- Chris Alden 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系），第一章《面向 2030 年：国际发展合作和南南发展合作革新概览》，与 Folashade Soule-Kohndou 合作完成。

- Ross Anthony 博士（南非斯泰伦博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第九章《中非南南合作》，与 Yejoo Kim, Emmanuel Igbino, Nusa Tukic 和 Meryl Burgess 合作完成。

- Biswa Nath Bhattacharyay 博士（亚洲开发银行前高级顾问），第十二章《南非的发展合作：趋势、前景与挑战》。

- Richard Carey 先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前主席），第三章《发展合作新理念：一个共同的目标》，与徐佳君博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执行副主任）合作完成。

- Sachin Chaturvedi 教授（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与信息系统主任），第十一章《南南合作框架和印度发展伙伴关系的新兴轮廓》。



• 谷靖博士（英国国际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新兴国家及全球发展中心主任），第十三章《国际发展合作的变化动态》。

• 黄梅波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第六章《南南发展援助》，与陈娜合作完成。

• 李小云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第二章《新南南合作的兴起：历史、现状、挑战》，与肖瑾合作完成。

• Carlos R. S. Milani 教授（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社会与政治学研究所教授），第十章《巴西发展合作：参与者、利益和未来的挑战》。

• 姚顺利教授（应用国际贸易研究所所长），第五章《基于全球价值链建设的南南贸易合作——中国的启示》。

• 叶初升教授（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评论》主编），第七章《南南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报告》，与惠利（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博士后）合作完成。

为了更好地组织这份南南合作报告的编写工作，南南合作金融中心邀请了北京大学夏庆杰教授（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作为本报告的主编。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顾思蒋为本报告的翻译、编辑、总撰做出了巨大贡献。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唐琦、陈雨露参加了本报告的英译中工作。

余漫博士参加了与本报告相关的多次会议以及报告的英译中工作。Mohnish Kedia 先生（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硕士研究生）为本报告英文版的编辑做了一定贡献。

感谢我的同事 Joyce Zhang, Jenny Yao, Au Yeung King Hau, Susan Zhao, Tim Pan, Mancy Yu, 他们都为本报告的出版做出了贡献。^①

吴 忠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副主席、总干事

① 注：本报告每一章的内容均纯属相关作者的观点，而非南南合作金融中心的观点。

摘 要

本报告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国际发展合作和面向 2030 年的南南发展合作创新，并就南南发展合作对全球发展的贡献进行评估。本报告力图反映发展合作的新创意、新机制和新办法。第二部分的焦点是南南贸易合作、南南发展援助与技术合作以及南南直接投资。第三部分是主要南方国家的南南合作的案例研究，如中国发展合作的新设计（“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发展合作、巴西的发展合作、印度的发展合作、南非的发展合作，最后是对国际发展合作动态变化的考察。

Abstract

This report includes three parts. Part I first gives an overview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the innovation of South-South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towards 2030 , then lay out the evaluation of contributions of South-South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to global development. This report tries to reflect the new ideas, new mechanisms and new approaches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art II focuses on South – South Trade Cooperation, South – South Development Assistance/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and South – South Direct Investment. Part III explores the case studies on the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 of major south country, such as China’s New Architecture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Brazil’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dia’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South Africa’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finally concluding the changing dynamic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2017年南南合作报告主题

一 南南发展合作的起源与发展

南南发展合作在过去的五十年中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传统西方发展分析家们曾认为南南发展合作（也被称为南南合作）是地方性的、无关紧要的，然而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等部分地区去殖民化之后，逐渐成为新兴的南方部分地区和其他合作伙伴的重要发展引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11年底在韩国釜山召开的援助有效性高层峰会上增强了对南南合作的认知，强调了南南合作的全球地位变化。随着南南合作转向应对未来数十年的发展挑战，它需要继续展现这些充满活力的特质，这一点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有所体现。

南南关系通常指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技术、社会和文化关系。尽管这些关系最初是由对殖民主义的反应而塑造的，并且在冷战期间由意识形态推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关系的本质和增长均发生了演进。在动荡的冷战环境下，发展中国家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仍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它们各自的位于北半球的前殖民宗主国。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较为薄弱，并且带有北南依附模式的印记。

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关系形成于1955年，当时联合国成立了亚非小组，使非洲国家和新独立的亚洲国家能够走到一起。同样的关系也建立于不结盟运动（NAM）首脑会议上，这一会议紧接着万隆会议，举办于1955年4月。新世界经济秩序的第一次激荡发生于1964年一些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兴起机构的形成和制度化，诸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以及77国集团。在1973年石油危机和资源卡特尔崛起的余波之下，一个新的自信的南方集团——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呼吁直接对话以创造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良好环境。资源卡特尔在发展中世界快速地兴起，产生了边际效益，因



为发展中国家试图利用商品作为获得更好贸易条件的工具。

事实上,直到1986年,作为术语的“南南合作”并未出现在一些著名的发展中国家组织的书面宣言中,如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或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它的第一次使用是在1986年第八届不结盟运动峰会提出的《哈拉雷宣言》中。

尽管这一渐进的制度化成果成倍地提升了发展中国家间的交互,这一阶段的南南关系在实质上仍主要是政治的,且南南经济交互水平与南北贸易流相比仍保持在很低的水平。

当前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在经历一个新的经济变动,尤其是商业变动,源自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发达国家的经济收缩。1995年南南出口仅占到总出口的12%,年增长速度为8%,这一指标在2010年经历了一次跳跃,占到全球总出口的23%,并且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

引领发展中国家之间这些快速增长经济流的是中国、巴西、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南非也是如此,不过影响程度稍小。南南关系的加强也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国家诸如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崛起,这些国家渴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使自己成为来自南方的新兴力量。这一对国际地位和声望的要求,也体现在它们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援助的加强上,此举使它们能够作为新兴援助提供国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

上述所有改变的结果,是南南关系逐渐实质化,超越了最初政治宣言的意图。“南南”关系不再仅仅指意识形态,也不再仅限于政治和政府领域。这一变化与变动的全球环境成为常态,并且影响到私人部门,包括一些投资银行在内,也希望能成为这一变动的一部分。

二 南南发展合作的革新与动态

(一) 变化的原则

金砖国家和新兴市场会对国际发展援助当前和未来变化的关键进程带来何种影响?发展伙伴关系核心原则和价值理解上最为明显的改变,就是更强调平等、互利、政治无干涉以及拒绝附加条件;所有这些新的原则和价值都已嵌入过去和现在的共同经验以及对未来的共同展望。这些原则和价值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4年举办的新独立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共同参与的万隆会议上发表的宣言。这次会议宣言的主要贡献者是中国总理周恩来,他介绍了中国自己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带入会议的讨论阶段和最终的文件,这些原则现在仍是金砖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原则的一部分(Gu et al., 201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7月于俄罗斯乌法举行的第七届金砖国家峰会上发表了讲话，阐述了他对金砖国家发展合作方法的看法，他强调，在金砖国家提供发展援助、满足关键的能力建设需求、促进南南合作的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在自身发展的问题上承担更多的责任。习主席认为：“金砖国家也应建立新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督促发达国家承担应有的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自身发展能力，缩小南北差距，加强南南合作，在互利双赢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寻求自我完善。”巴西的方法也强调在南南合作原则和实践的框架下开展工作，“因为这样能加强总体交流；产生、传播并应用技术知识；建设人力资源能力；以及，最主要的，在所有涉及的国家中加强机构的力量”（Brazilian Cooperation Agency, n. d.）。

我们来看这些原则中的一条——不干涉，这是金砖国家的核心原则之一。它指的是在保持互利和平等关系的同时，不对伙伴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换句话说，指导原则是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尊重伙伴国家的法治和政治主权。

（二）变化的实践

新兴大国在改变国际发展援助中做出的第二项重大贡献是改变了实践做法。南南合作与“传统”援助不同，通常在不要求任何政治先决条件和改革的情况下提供资金流。这个原则受到接受援助国的好评。

新兴国家提供国际发展援助的方法还有另一个独特之处，比起发展援助委员会（DAC）定义下的“援助”，它们在进行国际发展合作时，使用了更广泛的金融及其他工具（Chahoud, 2008）。这些工具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优惠贷款”（Mawsley, 2012）。传统援助者很大程度上在“商业”和“发展”考量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限，而新兴国家在使用优惠贷款的过程中，则模糊了这一界限，使之变得不那么透明。实物偿还，即贷款人同意接收货物或资源以作为发放贷款的回报，或接受资源的使用权作为贷款的担保或保障。传统捐助者批评这些工具和这些非传统条款的使用。然而，正如 Bräutigam 指出的那样，比起既有的正统方法，这种方法提供了一种更为可行和可实现的获取还款的方式，当受援国拥有丰富资源，但外汇储备较少时尤其如此（Bräutigam, 2011）。这种类型的贷款通常是更广泛的一揽子措施的一部分。

第二类值得一提的工具是出口信贷。此类工具被新兴国家广泛使用，为国内公私营公司在受援国开展业务提供激励。出口信贷并不仅限于国内企业，它们也被提供给一系列的国际金融机构，包括地区开发银行、外企甚至是政府。使用这类工具的优势在于，它们为上述机构和企业提供了一种支付来自援助提供国的产品和服务的优惠基础。

新兴国家发展合作方法的一大关键特点是关注技术合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正是



在发挥这些国家的力量。来自新兴国家的技术合作经常基于它们自身独特的发展经验。例如，根据自身经验，巴西在“打击城市暴力和青少年帮派、扫盲项目、农业技术普及、艾滋知识普及和防治行动”（Mawdsley, 2012）上具有较为值得称道的经验和专长。像印度、中国和巴西这样的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着基于广泛领域技术支持的长久关系，这些领域涵盖医疗卫生、教育、农业生产、通信、交通基础设施、科学知识、建筑技术，以及“清洁”能源。对技术合作的关注为新兴国家带来了许多优势。例如，更实际地说，它们为项目的管理监督和控制以及通过对具体实践成果基准来评估项目进度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技术合作的优势还在于其很好地与南南合作的中心主题和焦点相契合——提升知识和技能的分享与交换，以早日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例如关于教育和健康的目标（King, 2014）。习近平主席在 2015 年约翰内斯堡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宣布的 10 项中非合作项目中的大多数属于这一范畴的援助，这些援助项目大多以 2000 年以来举办的六次中非部长级会议所做出的承诺为基础。印度也大力强调通过其技术与经济合作计划（ITEC）开展技术合作，该计划发起于 1964 年，覆盖了 158 个发展中国家。2011 年，印度向非洲提供 7 亿美元用以建设研究机构、建立培训项目，并出资 3 亿美元用以建设埃塞—吉布提铁路。技术与经济合作计划通过以下方式提供能力建设：技术培训和知识共享，项目援助，支持技能开发的专业化机构建设和通过印度文化关系理事会管理的高等教育奖学金。技术合作同时也让提供者获得了有用的潜在公共关系收益，它们能够记录这些实在的成果，作为一种“不是胡扯”且“能把事情搞定”的方法的证据，这一观点经常被用于支持中国在非洲的技术援助。

（三）变化的机构

改变的第三层面来自机构。此类改变源自新兴国家对基础设施发展和双边与多边技术合作的重视。

据估计，全球年度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大约为 3.7 万亿美元，其中每年仅有 2.7 万亿美元在当前得到满足。大多数的需求集中于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是专门为弥补基础设施融资缺口而设立的新机构的强力支持者和赞助者。这一承诺直接来自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殖民者的破坏、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早期的经济失败，使对基础设施的重视深刻融入中国发展方法的血液之中。认识到既有发展融资供给中的缺陷后，更广泛的国际发展机构框架使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以及更广泛的新兴国家开始倡议建立新的机构来填补这一缺口。因此，近年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国家（BRICS）、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非洲开发银行（ADB）中的一项专门基金和南南合作（SSC）基金相继成立。

2013年，金砖国家以1000亿美元的启动资金成立了新开发银行，以资助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并建立了一项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安排（CRA）来帮助应对新兴国家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

NDB的职责是提供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这能广泛地反映出金砖国家发展计划和南南合作的优先事项，以及中国对于这些因素的重视程度（Abdenur, 2014）。Rodrik（2014）对发展合作中关注基础设施合作的做法表示失望，他认为这是一种过时的经济发展观点。然而，其他人则认为这是“填补了国际金融框架中的一项重大缺口”（Dixon, 2015: 4; Chin, 2014）。这一缺口是传统援助者留下的，他们更多地将关注点转移至健康与教育，在基础设施上花费的援助预算少于10%（Chin, 2014）。

AIIB于2013年由中国提议组建，于2016年底开始运作。AIIB的任务是资助基础设施需求。AIIB被认为会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OBOR）倡议，以促进中国、亚洲和欧洲之间的互联互通与合作（Callaghan and Hubbard, 2016）。习近平主席宣称：“中国发起并与其他一些国家共同建立AIIB，旨在为‘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发展的资金支持，并促进这些国家间的经济合作。”AIIB的建立也被视为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不情愿态度的回应，此举能扩大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影响力（Callaghan and Hubbard, 2016; Griffith-Jones et al., 2016; Kawai, 2015; Reisen, 2015）。Reisen（2015）和Wang（2016）都提出，这些新机构的建立，可能加速改革，增强新兴国家在既有多边组织中的话语权。

与现存的多边发展银行不同，减贫并非AIIB的明确目标。它与NDB相似，更关注基础设施，但有一项研究认为，“AIIB可能会很快加速放贷，并在十年内持有超过NDB两倍以上规模的资产组合”（Humphrey et al., 2015: 3）。然而，AIIB的职能并不将减贫、健康或教育，以及向发展中国家发放优秀贷款置于优先地位（Kawai, 2015: 8）。

AIIB表示，已经采纳了现行的多边开发银行（MDB）环境保护和监测标准。AIIB强调将标准与接受国的程序相结合。现有的多边发展银行无法做到这一点，这被Humphrey等人描述为“现有MDB们的重大失败，它们总是更关心如何在NGO和国内政治家的批评中保护自身的项目，而非真正达到发展目标……AIIB可以通过派遣专家组对工程、可持续性、社会 and 环境影响、财政、规则与定价、项目融资框架，以及如何吸引外部公共和私人投资者等问题提供建议，从而在这一领域引领风尚”（Humphrey et al., 2015: 6）。

印度、巴西和南非在2003年法国G8峰会上建立的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IBSA），在日期上早于金砖国家机构。这个集团已经“变成了三个新兴大国交互的有趣平台，它们可以在此讨论、协作，并商讨一系列国内和地缘政治问题”（Stuenkel, 2013: 17）。这一集团成立背后的动机是它们共同的利益，尽管与它们在金砖集团中所面对的关于它们之



间分歧的批评类似，但在原则上——与所有民主集团一样——应该更加类似。这一集团已迈出了一些制度化 SSC 的步伐，例如成立了一个 IBSA 基金（每个国家每年贡献 100 万美元），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管理，资助了许多南方国家的项目（Stuenkel, 2013: 17）。然而，Stuenkel（2013）认为，该集团与传统国际组织的区别主要在于其缺乏制度化。例如，“没有迹象表明该集团会发展出有约束性的规则和常态（并且）这或许是其与传统多边机构以及那些制度化南南合作的新努力之间的最大区别”（Stuenkel, 2013: 19）。尽管这一点可能随着新金砖国家机构的变化而改变，但是它阐明了一种方式，采用这种方式的区域论坛并不总是互补的，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建立的 AIIB 和 NDB，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了 IBSA 的重要性。

三 南南发展合作的案例研究

（一）中国与非洲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中国与非洲大陆之间已经从主要基于政治伙伴的关系转变为主要基于市场互动的关系。19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主要在冷战时期建立，此时各社会主义国家均结成同盟。在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在诸如获得联合国成员资格以及政治孤立台湾的问题上寻求非洲国家的支持（Yun, 2014）。非洲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如津巴布韦、埃塞俄比亚和赞比亚等，也从中国获得了各种形式的发展援助。随着冷战结束，中国的政治目标基本达成，之前在非洲的援助开始累积为不可持续的财政成本（Yun, 2014）。20 世纪 90 年代，中非关系再次深化。由于经济由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导向，中国制造业部门有了快速的发展。为了保证制造业部门的发展，中国再次寻求非洲的帮助以获得原材料（Cissé, 2013; Moyo, 2012）。

过去二十年中，中国与非洲大陆的关系主要受几个经济因素的影响，包括中国需要资源来发展国内经济以及通过市场准入和技术、知识转让促进国际竞争力（Cisse, 2013; Alden and Davies, 2006）。这也标志着中非关系从主要基于政治动机进入基于经济动机的新时代。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南南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个因素的结合——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命运感以及期望利用当代市场力量来实现这一愿景。

互利互惠平等的原则在今天依然指导着中国的外交政策，也是中国制定同发展中国家相互合作的八条标准的基础。“中国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八项原则”也被称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Yun, 2014），包括：

- （1）强调平等互利；

- (2) 尊重主权，绝不附加条件；
- (3) 提供免息或低息贷款；
- (4) 帮助受援国独立发展，自力更生；
- (5) 建设投资少、收效快的项目；
- (6) 以市场价格提供优质设备和材料；
- (7) 确保有效的技术援助；
- (8) 根据当地标准支付专家薪酬（Chin，2012）。

Grimm（2015）指出与中国的合作协议通常是在政府与政府的谈判中制定的一揽子交易（与南北合作中双边援助的方式相同），包括援助措施、商业贷款和重点中国公司的一些战略投资支持。在此过程中，南南合作涉及大量的参与者：国家、商业团体（国有和私有）和民间社会团体。

中国在非洲进行的大量大规模计划意味着中国将在未来持续参与其中。中国已经在许多方面的行动上取得成功，比如提供各种形式的发展援助，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改善。至关重要的是，中国改变非洲产业化格局的程度将决定非洲经济是否更加繁荣。从南南合作的角度来看，加强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在2015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政府承诺将投入100亿美元设立“中非产能合作基金”用于支持行业合作，其中包括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农业、能源、基础设施、金融和工业园区的发展。该基金也将通过在非洲设立专业学校来支持20万名非洲专家的研究以及4万名在华非洲人员的培训。当然，在争取南南合作方面，中国的成绩令人印象深刻，并且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很大的潜力。

与此同时，如此大规模的发展援助也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负面影响，这是无法避免的。在这方面，将所有的过错归咎于中国是不公平的。今天西方国家同样要应对一系列类似的问题，比如环境恶化、企业社会责任、采矿等。此外，西方国家对非洲原材料有着严重的依赖，而这种情况经常由中国承担责任。从技术上来说，因为中国和非洲都属于发展中国家，所以仍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中非合作论坛的结果能够反映相关政策，很明显，中国越来越重视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等问题，而这些也都是中国在国内都面临的挑战。在许多方面是非洲政府决定了执行的情况，而非中国。不同的国家实行不同的政策，有的国家的条件相对严格（例如卢旺达和博茨瓦纳），有的国家则相对宽松一些（例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莫桑比克）。关于中非关系有一个不太能理解的方面，就是非洲国家的机构在参与讨论的过程中往往属于非常弱势的一方。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洲国家不仅仅应当与中国成为合作伙伴，还应当借助其激发自己的潜力，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国家。



（二）巴西的发展合作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巴西就作为提供援助方参与国际发展合作（IDC）。然而，巴西的政府资金及其在国际发展合作方面的利益诉求是在 1988 年宪法的制定之后。尤其是 2003 年，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民间组织，巴西给予了南南合作强烈的关注。根据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和巴西发展合作署（2010，2013）的官方数据，从 2005 年到 2010 年，巴西的国际发展合作数额从 1.58 亿美元上升到大约 9.23 亿美元。其中，技术援助支出增长了 4 倍：从 1140 万美元上升到 5770 万美元。人道主义援助从 48.8 万美元上升至 1.61 亿美元。官方公共支出显示，2010 年，巴西国际发展合作的分布情况为：68.1% 在拉丁美洲、22.6% 在非洲、4.4% 在亚洲和中东、4% 在欧洲、1.1% 在北美。具体到拉美，前五名的合作国家占到了巴西国际发展合作数量的 80.4%，这五个国家的占比分别为：海地（47.4%）、智利（16.3%）、阿根廷（8.6%）、秘鲁（4.5%）和巴拉圭（3.6%）。

巴西发展合作署公布的数据也表明巴西对国际发展合作越来越感兴趣的事实。根据其线上数据库的资料，从 1999 年到 2012 年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实施的 1464 个项目分布为：南美洲 577 个、非洲 552 个、加勒比地区 164 个、中美洲 90 个、亚洲 65 个、北美洲（墨西哥）15 个，以及大亚洲（巴布亚新几内亚）1 个。从部门来看，这 1464 个项目中，573 个是社会政策类（包括健康、文化、体育、社会发展、环境和教育），539 个是治理类（包括公共管理和规划、城镇发展、司法、法治能力建设、国防和安全）。

巴西的国际发展合作注重实践经验的分享，并且强调运用官方、公务员以及公共机构作为首要途径实施其国际发展合作行为。另外，巴西的国际发展合作活动并不包括对合作方的直接转账方式。实际上，巴西的国际发展合作是作为一种公共支出，遵循每年的预算法并记入年度开支当中的。因此，其国际发展合作并不包括对投资贷款的补贴或出口债务的冲销，赠款（Grants）是主要的形式，包括两种具体的支付方式：（1）支付给公务员及其从事的与合作相关的行政活动（机票、津贴、工资、技术工时费、奖学金以及补贴）；（2）与多边机构合作的资金投入（IPEA and ABC，2013：14）。

巴西已经加入包括印度、南非和中国在内的国家群体中，试图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援助体系中的地位提出挑战（Mawdsley，2012）。尽管这些国家分别具有各自的特征，但它们在“援助有效性”或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等问题方面，有意愿建立一套属于自己政治理念的国际发展合作体系。基于学者对（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合作的负面评价（Easterley and Pfitzweil，2008；Escobar，1995；Hayter，1971；Naylor，2011；Pankaj，2005；Rist，1996），我们对这种新兴的趋势表示绝对支持，因为这种趋势意味着打破一种“小团体性的”政治和文化垄断，而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合作缺乏法律和全员参与，尤其是对